

集體記憶的民主參與：
臺北 101 伙伴碑個案研究¹

顧玉玲²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Memory:
A Case Study of the Partners' Memorial at Taipei 101

Yu-Ling Ku

關鍵詞：臺北 101，伙伴碑，職業災害，集體記憶，觀眾研究

Key Words: Taipei 101, Partners' Memorial, occupational injuries, collective memory, visitor studies.

¹ 本文大幅改寫自本人博論《紀念過往，反思現在：臺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2019) 第六章個案研究的部分文稿，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精確的修改建議，並向編委及執編的編務勞動致上謝忱。

²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人文學院專任講師。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yulingku@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 年 4 月 21 日)

摘要

臺北 101 作為臺灣重要地標，在大樓信義路側設有七塊琉璃牆所組成的「伙伴碑」，色彩鮮艷，十分醒目，成為過往人潮駐足拍照的重要景點，卻罕有人知道這是為了紀念 2002 年 331 大地震職災死亡的工人。本論文爬梳建碑源起，以伙伴碑的空間配置及碑文作為敘事分析的文本，並設計三次覽導進行觀眾研究，在互動中展開多元解讀，探討工殤碑如何與當代社會對話。研究發現，工殤紀念碑愈醒目愈受肯定，但若只在表現形式上親民，卻在內容上迴避職災究責，容易引發當下觀眾反彈及對立解讀。伙伴碑的人名是重要的紀念主體，從收集到排列都需要開放民主參與，建碑前開放公共討論以建構社群認同，建碑後以多元方案創造觀眾參與的對話平台，以行動創造民主參與，才得以朝向公共的集體記憶。

Abstract

The Partners' Memorial, composed of seven works of glass-wall installation art, is located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landmark skyscraper Taipei 101 in Taipei City, Taiwan. The memorial's bright colors and eye-catching features made it a popular spot for tourists and passengers to stop and take pictures. However, few people are aware that it was erected to honor workers killed in the 331 Earthquake in 2002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ipei 101 build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the Partners' Memorial, through analyzing the space and inscriptions on the memorial as narrative and text. Three guided-tour approaches are designed as methods to conduct visitor research, which will explo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interaction event and explore how the past communicates with the pres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numerous sectors of society, in addition to workers, were purposively involved in creating this memorial to foster and reinforce a sense of community.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visitors may be more prone to experience negative feelings and adopt an opposing interpretation of memorial narratives when viewing memorials that evince superficial sympathy to victims and avoid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to the associated disaster even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the names of workers on the memorial, in addition to the open and democratic vetting and selection process. A democratic-participation approach to establish labor memorials promotes community identity and facilitates the creation of a platform for public dialogue.

臺北 101 大樓與購物商圈靠信義路側，人潮聚集，由七塊巨型七彩琉璃牆所組成的「伙伴碑」，佔地最廣、最引人注目。這座由七面 3 米高、2 米寬、厚 80 公分的立體彩色琉璃牆所組成的紀念碑，以七巧板拼湊為牆面，採半透明的琉璃材質，黃、白、紅、藍、綠、橙、紫色彩飽滿，夜裡由空心磚內襯的燈光點然向外照射，七彩燈光更引人注目，成為臺北 101 南側最顯眼的地標——雖然多數人都不知道這是一座工殤紀念碑，追悼臺北 101 建造過程中因 331 地震等職災因素而去世的工人，由勞資協商命名「伙伴碑」。

本文以臺北 101 伙伴碑作為研究對象，前溯立碑前的職災與協商，後及立碑至今的觀眾反應，討論創傷紀念空間如何在商業觀光環境下，引發觀者進一步反思社會議題？人們在日常生活的休閒消費中，如何經由紀念碑探究歷史脈絡？這些看似衝突的既存元素，如何成為開放對話的平台與據點？



圖 1 臺北 101 伙伴碑
(攝影／顧玉玲)



圖 2 伙伴碑的夜間點燈
(攝影／顧玉玲)

一、摩天大樓與 331 工殤事件

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裡，高樓能夠在有限範圍內集中貨物、服務的提供，有助於降低販售成本，也加強都市土地的使用效率，因而大都會高樓林立。

暗夜樓燈不滅的宏偉景觀，透過強勢媒體行銷全球，也型塑了發展中國家對現代化的單一美學想像。其中，現代建築科技所支撐的摩天大樓，依其能見度、話題性，成為顯著地標，既挾有商業廣告效益，又成為經濟成就的象徵。於是，爭高炫富的超高層建築成為新寵，新的世界記錄一再打破，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爭搶世界第一高樓的寶座，彰顯資本與科技實力，也促進觀光收益，與商業經濟力量緊密結合。

臺北 101 的前身「臺北國際金融中心」，是臺北市政府第一個 BOT³案。1997 年，為了落實「亞太金融中心」的政策方向，臺北市政府將世貿旁的精華地段，以七十年租期簽訂給民間團體，由宏國建設等集團企業組成「臺北國際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北金融大樓公司」）取得地上開發權，設計成包含辦公、購物、娛樂、藝文活動等綜合性功能的金融商圈。次年變更計畫蓋 101 樓層高的辦公大樓及 60 公尺高的裙樓為購物中心，對外宣稱落成後將成為世界第一高樓。⁴

2002 年 3 月 31 日下午 2 時 52 分，臺灣花蓮外海發生規模 6.8 的強震，臺北最大震度 5 度，各地不斷傳出民眾被掉落物砸傷的事故，最嚴重的傷亡，發生在當時已興建至二百多公尺高的臺北國際金融大樓。地震當時，大樓內共有二百多名工人勞動，因強震晃動，樓頂二支塔吊機具的東、西側人字臂螺絲鬆脫、斷裂，數噸重的人字臂鋼鐵從五十六層的頂樓掉落，擔任吊架操作員的陳信陽、陳又禎連人帶車從高空墜落，懸吊在五十四樓施作鋼骨組合的林建成、陳錦水遭受鋼鐵重擊，還有半工半讀的助理工程師孫同英被高速墜落的吊架鐵片壓中。⁵

331 工殤事件，造成五名工人不幸罹難，另有輕重傷十九名，震驚臺灣

³ BOT 全稱為「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由政府提供土地，收取權力金，民間建造經營。

⁴ 2004 年底臺北 101 落成，樓高 508 公尺，勇奪「世界最高樓」，但 2010 年初就被杜拜的哈里法塔（Burj Khalifa）828 公尺高的記錄打破了，至 2020 年 2 月，臺北 101 大樓位居世界第 12 高樓。

⁵ 綜合 331 大地震當日及次日各家新聞報導。

社會，讓工程界重新檢討摩天大樓作業安全，修法重擬安全標準。⁶此外，重大職災引發勞工團體⁷關注，要求建立工殤碑，獲得勞資政三方同意等組建碑工作小組，經過五年四十餘次的勞資政三方會議，決議在臺北 101 靠信義路側的通道上設立「伙伴碑」，將所有參與高樓建設的勞心勞力者都並列，特別紀念 331 工殤的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以及隨後因大樓電梯作業感電辭世的工人張達權。

地震後月餘，臺北國際金融大樓更名為 Taipei 101，以活潑的命名揮別震災陰霾；2003 年 10 月，臺北 101 購物中心開幕；2004 年 12 月，101 層樓高的辦公大樓正式運作；2007 年 4 月 28 日，伙伴碑正式揭碑。這座碑由新加坡裝置藝術家 Florence Ng 設計，以半透明琉璃磚為主要材質，採斜角、直線構成不規則的幾何圖形，意在喚起許多人孩童時把玩七巧板的共同記憶，與本土經驗呼應，且碑面以各種形狀堆疊而成，也可以詮釋為工地上不同種族、職種、性別的組成，讓紀念意義更多元。⁸有童趣、色彩繽紛、生氣盎然、富親近性，是伙伴碑最不同於過往創傷紀念碑之處。

二、論述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集體記憶與社會協商

集體記憶唯有依賴著不斷再生產才能傳遞下去，而再生產的物質機制，就是聚會慶典、紀念建築、論述等，對過往經驗進行傳遞、強化或重溫，對

⁶ 1984 年發布的「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地震力計算以自重的 20% 為水平設計，未考量吊物的重量。經過 331 地震的工殤事件，相關研究才一一指出：若塔式起重機架設在高樓上，從底部輸入的振動有顯著放大作用，且塔式起重機與主結構體如產生共振，將使起重機的受力更加強化（蔡榮根等，2002；楊俊隆，2003；曹常成，2005）。俟後，行政院勞委會草擬新的塔式起重機耐震設計規範，特別針對超高建築物的塔式起重機作業，要求進行微震測析，加強地震防墜落等措施，新的法令於 2005 年正式發布實施。

⁷ 建碑訴求來自四十餘個工運組織連署推動，最後由工傷協會、工委會、北市產總派員參與勞資協商會議，歷時五年。

⁸ 工委會、工傷協會，2007 年 4 月 28 日。〈臺北 101 伙伴碑揭碑典禮〉新聞稿。

大眾形成意義(Halbwach, 1980)。紀念碑作為史料、文本、物質化的客體，讓過往的事件得以具象化、視覺化，在公共空間佔有一席之地，多半是與建碑時的統治權力相符，也可能形成「空間霸權」(spatial hegemony)(Krzyzanowska, 2016: 469)。上個世紀末，隨著記憶政治的研究，人們也開始檢討過往紀念碑與政權的緊密關連，質疑並抵抗傳統紀念碑永恆不朽的意象，各種反紀念碑(counter-monument; anti-monument)的紀念方式也紛紛出現，藉著紀念形式的突破，取消單一的歷史敘事，也挑戰與觀眾互動的可能，看重具體行動的社會實踐。矛盾的是，反紀念碑用各種去形式、消失、分散、自我結束的方式出現，不承擔歷史詮釋的重責，嘲弄永恆的記憶與傳統的單一史觀，但卻重振紀念碑最希望留存的記憶的作用，其在社會引發的討論與思辨，使現在不斷與過往對話，在城市中留下持久的影響力(Young, 1992: 267-296; Krzyzanowska, 2016: 471-472; Eross, 2017: 19-32)。

事實上，以「反」為名的紀念，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邀請觀眾的民主參與，旨在挑釁而非安慰，不接受紀念碑承擔記憶工作，要把記憶與傳播的責任丟回到觀眾手上。James Young(1993)探討紀念碑的藝術表現及社會效應，認為立碑者可能依「國家利益」的需求而形塑、重建記憶，但一旦紀念碑被創造出來了，紀念物質就有其自身的生命，可能會反過來對抗原有的企圖。John Urry(1996)也提到，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追憶，因此紀念空間必須能容納多元並陳的聲音，人們得以爭論和重新定義過往。換言之，紀念化可能撫平傷痛，可能挾帶政治作用，但更多是和當下社會的交流與協商。使用過去來與現在的社會對話，設計行動和社區交流，引發參與(Smith, 2006)。集體記憶是競逐的、協商的、民主的，可以對話與互動，溝通與參與才是紀念的最重要意義。

臺灣近代碣碑研究，多數由文化資產入手，採拓登錄，成為臺灣史地沿革、政經發展、社會宗教等重要史料(林文睿, 1999; 何培夫, 2001; 曾國棟: 2003)。解嚴後各式紀念碑、博物館的大量興建，也成為記憶研究的重要素材，但多半聚焦在內容更豐富的博物館館藏及展示，附帶提及紀念碑的

碑文及形式解讀（陳佳利，2009；曹欽榮，2015）。本文研究臺北 101 伙伴碑，嘗試與此時此刻的臺灣社會對話，開啟集體記憶的民主參與，在臺灣文化資產的領域中建立本土工殤碑歷史的研究基礎。關於記憶與歷史的辯證關係，Pierre Nora(1995)曾提出「記憶之所」⁹的概念，探討記憶如何持續被建構、利用、與誤用，而非被歷史編撰的結果。「記憶之所」拉開了記憶論述的廣度，探討的對象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只是象徵性的，是記憶與歷史互動的結果，但關鍵在於兩者的互動必須由有意記住(intention of remember)開始。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有意記住，並持續改變的動能，才能讓意義一再重來、起死回生(Nora, 1989: 19-20)。針對臺北 101 的伙伴碑，本文採用文獻資料收集當年事發時的新聞報導，實地踏查與分析伙伴碑的空間及碑文敘事，重建多元歧異的歷史敘事，再經由動態的觀眾研究，檢驗建碑後的公共效應，以引發意義延伸的對話平台，讓工殤碑成為內涵複雜多義的記憶場域。

（二）設計導覽的觀眾研究

文化資產的研究，從早年以「物」為主，到近年來轉向以「人」為關注核心，強調多元敘事與民眾教育，加強與社區發展的連結(Hooper-Greenhill, 1992; Adams, 2001; Shelton, 2011; McCall & Gray, 2014)。此處借用博物館學的觀眾研究，設計伙伴碑的導覽行動，再以現場參與觀察、開放式問卷方式，收集特定觀眾的反應，以提出未來的行動建議。觀眾研究一般大致區分為研究(study)、評量(evaluation)，前者針對概念與理論建立，以長期的知識生產為主；後者則多針對特定實務方案，調查觀眾以評估成效（Kelly, 2005；劉婉珍，2011：4-8）。研究與評量雖有方法與目的上的差異，但也相互影響，

⁹ 記憶之所，法文 lieux de memoire，中文翻譯繁多，曹欽榮（2011）譯「記憶的遺址」；戴麗娟（2012）譯為「記憶所繫之處」；陳瑞樺（2013）譯「記憶之所」；陳香君（2014）譯「記憶場域」；黃艷紅（2015）譯為「記憶之場」；另有記憶之處、記憶場址等。我在本文中沿用陳瑞樺的「記憶之所」，保有戴麗娟翻譯意涵，但取陳譯的順口易記，行文時較為順暢。據陳瑞樺（2013：15註2）的詮釋，「所」既做為名詞所指涉的物理空間，又做為代詞以指事物本身，「記憶之所」的中譯得以維持與原文的對應性，及詞彙的多義性。

George E. Hein (轉引自王啟祥, 2004: 96) 就認為評量也可達到研究所要求的知識性目的, 研究影響展示、動線與活動的決策依據, 因而王啟祥(2004) 依各家說法將觀眾研究分為調查、研究、評量三個互有交集的區塊, 調查反映觀眾基本資訊, 評量針對特定決策與行動, 研究則是概念或理論的建構。本文採用針對特定觀眾進行問卷調查, 再針對展覽現場及觀眾回應進行分析研究, 對伙伴碑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作出評量。

博物館學的觀眾研究, 不免扛負著來自贊助機構的壓力, 使其必須經由觀眾的肯定, 呈現博物館不可替代的社會價值(Scott, 2009)。伙伴碑立於免門票、無觀眾數量壓力的公共空間, 人來人往, 不計算流量, 但這不表示公共紀念碑就可以退居被動的守備位置, 而不積極建立與社會對話、教育民眾的主動作用。持平而言, 博物館與紀念碑有客觀條件的差異: 前者作為完整密閉的展示體, 有相對明確欲傳遞的教育作用, 觀賞者也多是買票入場的特定觀眾, 遵守一切約定俗成的觀賞秩序, 也帶有主動接近展品的意圖, 對觀眾進行量化問卷或質性訪談都還有一定的可信度; 相對的, 紀念碑散佈在交通要道、商圈、休息站等公共領域, 是一個對外開放、免付費的人潮往來之處, 人們也許是路過也許是刻意繞來觀看, 都不是在設定好的展示流程, 他們自拍、吃冰淇淋、邊走邊玩鬧, 可能駐足閱讀碑文, 可能與朋友大聲議論, 更多是視而不見, 因此無法採取滿意度調查, 也不宜進行廣泛性的問卷, 而需要鎖定特定觀眾調查。

為了促成伙伴碑與社會對話, 研究過程中特別安排了三場導覽活動, 分別邀集板橋社區大學居民、北藝大通識課學生進行實地參訪, 進行開放式的回饋單調查, 以參與活動的觀眾意見作為研究素材, 瞭解其對工殤碑的視覺感受及意義認知。此方法明顯的限制是, 社大學員及北藝大修課學生都已是這個社會上對人權與歷史較感興趣並有一定的敏感度的人, 其成分背景的類近性也很強, 不能作為整個社會的採樣。但紀念碑設立在公共場合, 會吸引的本身就是有意識靠近觀看者, 或因看過相關新聞報導、研究報告而主動來尋找的人, 多數人視若無睹原就是社會常態, 一如博物館的觀眾也是主動進

場的對象。本研究探討的，並非紀念碑的宣傳效度，也非觀眾的學習成果檢測，而在於藉由一個空間與物件的導覽說明，使用過往的故事與現在的人互動，探索記憶溝通的可能，也企圖在有限的客觀條件下，實驗更多社會互動的方案，並藉由觀眾調查收集改進意見。

伙伴碑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公共平台，碑文與碑址都是權力競逐後的妥協成果，形成今日所見的語言及非語言符碼，不同觀眾帶著各自的文化、知識背景，原本就會影響個別的解碼方式。Stuart Hall(1993: 98-103)針對觀眾接收媒體訊息，提出製碼解碼的三種基本情況：一是觀眾完全理解並認同製碼方的訊息，進行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優勢解讀(preferred readings)¹⁰；二是觀眾接收到訊息的支配性編碼，但仍依各種條件採取協商解讀(negotiated readings)；三是有人完全依自己既有立場偏好，不受文本動搖，甚至因原有立場與編碼立場相異而採對立解讀(oppositional readings)。研究採用這三種基本立場的解讀，分析觀眾回應，立場是變動的、可挪移的，閱讀碑文看似被動，但對話可以創造更多樣的解讀空間，懸置定論，擴大紀念的意義。

三、空間與碑文的敘事分析

伙伴碑由七座磚牆構成，由西向東依次排列。第一座正面刻有主碑文，第七座正面是碑文，背面是臺北 101 及伙伴碑相關建設單位，中間五座前後都刻滿了無色字體的人名，共計上萬人。以碑文及空間配置作為敘事文本，重點分析如下：

¹⁰也有人翻為「偏好解讀」、「首選解讀」，但在本文的敘事脈絡中，採用「優勢解讀」較能表現 preferred reading 符合主流價值的意義。



圖 3 伙伴碑第一面磚牆上，鑲刻主碑文及六名工殤亡者的姓名。(攝影／顧玉玲)



圖 4 伙伴碑第二面牆上的前幾塊磚，都是政商名流的名字。(攝影／顧玉玲)



圖 5 伙伴碑最後一面牆，金融財團與工運團體併列。(攝影／顧玉玲)

(一) 工殤與往生

距離購物商場最近的首面琉璃牆上，鑲有白色透明長方型框架，主碑文以中英文書寫如下：

從這裡延伸出去的
 每一角段每一片段
 都有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
 獻給所有親身參與 TAIPEI 101 的伙伴
 並紀念因工往生的
 林建成 孫同英 陳又禎 陳信陽 陳錦水 張達權

伙伴碑使用和臺北 101 大樓外牆類近的透亮琉璃，閱讀主碑文的觀眾一

抬頭就可以看見高聳入雲的大樓，空間互有呼應，碑文更說明了「每一角落」、「每一片段」的主體是摩天大樓，連結到「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以生喻死，點出紀念主旨。協商建碑的過程中，臺北 101 對職災、工殤的字眼頗有忌諱，堅持以「因工往生」取代。¹¹不料碑文的英譯也避重就輕，沒有工，也沒有死，甚至沒有勞動者：

**From here, all you see was sculpted
piece by piece, through years of devotion.
Dedicated to all partners in Taipei 101 Project.**

英譯文以「伙伴」(partners)取代工人，成為指涉含混的字眼，抹去一萬個名字間的關係脈絡，出資與出力、勞心與勞力都在同一平行線上，彷彿風險與所得並無二致，簡化了伙伴的豐富意涵。且為了閃躲死亡意象，行文也連帶失去勞動力道，連「因工往生」也不見蹤影，工殤碑的主旨全然被「翻譯」不見了。

(二) 按「政」論「資」排序

走到伙伴碑的第二面牆，仰望第一塊透藍色磚上的名字，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依次寫著：陳水扁 馬英九 陳敏薰 焦佑倫。

陳水扁是揭碑時的總統，馬英九是當時的臺北市市長，這個紀念碑很明顯偷渡了資方對達官貴人的吹捧。據臺北 101 的官方說法，這二位當年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是「參與工程之政府代表，見證大樓興建過程」。¹²一萬名參與者的名單如何排列？資方表示由電腦隨機排列，建碑籌備會名單也受邀入列，工傷協會、工委會、北市產總共提供了二十個名字，要求列在碑上所有名字的最後，且要求團體名稱也置於最末端以作為歷史見證。¹³直到伙伴碑

¹¹ 詳見伙伴碑建碑會議記錄：2002 年 5 月 29 日至 2007 年 4 月 28 日。

¹² 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107)行字第 10705018 號函。

¹³ 詳見伙伴碑建碑會議記錄：2002 年 5 月 29 日至 2007 年 4 月 28 日。

建設完成，萬人名單的前面數十個全是政商名流，陳水扁、馬英九之後，陳敏薰、焦佑倫都是豪門後代，銜金湯匙出生，財富世襲化已然成形¹⁴。緊接著，第二、三、四……第一排最前面的磚塊裡，名字大多曾任臺北 101 董座，金光閃閃的財團代表，豪門脈絡牽親帶故。按「政」論「資」排序的碑文，反映了建碑時的社會關係。。

同一個「伙伴」，勞資各自解讀：勞方一廂情願認定碑上的姓名「不分藍領、白領，無論本籍、外籍」¹⁵，都佔有平等的空間；但資方卻將出資股東及官方重量級人物，全部名列前茅。實力對比，明顯是資方在建碑時搶得次序排列的地主優勢，但此舉也將在日後導致觀眾對資方的不信任，而採取 Hall(1993: 103)所說的對立解讀，認為臺北 101 根本只是拿紀念碑推諉責任。

(三) 老外與外勞

伙伴碑的第二至第六面磚牆，刻著上萬名參與者的姓名，除了最前面幾個赫赫有名的政商名流外，其他人都無從猜測其國籍、性別及職位。這些名字有中文也有羅馬拼音，後者以西方國家的英語姓名居多。研究過程中，正式函文臺北 101，詢問伙伴碑上的名單如何收集？勞心、勞力的比例分占多少？包含小外包工人嗎？是否仍保留這些人的工種、職稱、性別、國籍、年齡？他們知道自已的名字在臺北 101 前的紀念碑上嗎？得到的函覆是：「工程興建總計約四十餘國籍專業人士參與，故有許多羅馬拼音的外籍人士。因人員眾多，未以不同國籍或領域做任何分類統計。」¹⁶原來，這些拼音姓名多是外籍「專業人士」，依臺北 101 向主要的出資建商、建造與設計的包商收集名單，且英語系姓名佔多數，可想見被呈報上來的是白領專業者，而非佔工地人數大量的泰籍勞工。

¹⁴ 陳敏薰是臺北 101 大樓正式營運後的首任董事長(2004-2009)，也是當時中華開發金控的董事，父執輩則發跡自大稻埕的紡織及窯廠，是本土財團代表之一；焦佑倫也是臺北國際金融大樓的董事長(2003.9-2004.5)，華新麗華董事長，兄長是華邦電子董事長，是外省財團的重要代表。

¹⁵ 工委會、工傷協會，2007年4月28日。〈臺北 101 伙伴碑揭幕典禮〉新聞稿。

¹⁶ 臺北金融大樓公司(107)行字第 10705018 號函。

當年勞工團體雖強調要放上移工姓名，但名單由各股東、建設、營造公司提供，恐怕多數公司還是以編制內人員為主，或優先排上日本、歐美高階主管與工程師，那些在工地現場實際從事最底層工作的工人，多屬營造業層層外包的小包商工人，就在名單收整的過程中，掉落在歷史紀事之外。換言之，即便是工人抗爭多年而來的工殤碑，終究還是被資方以階級、種族篩選過紀念名單。

（四）性別比例與象徵符號

鏤刻琉璃磚上一萬名勞動者姓名，是伙伴碑的重要主體，讓所有參與建設高樓的工作者共同現身，每個人都平等佔有同樣空間。近身探看這些名字，就會發現女性佔有近半比例，明顯高出一般營造業從業人員的性別比例。名單排前的政商名流中明顯以男性居多，但是在之後的成千上萬個名字裡，男女比例差距並不算高，即便是羅馬拼音的外籍人士也是男女皆有、性別均衡，遠不同於營造業工殤碑以男性為主的單一呈現。合理的推論是，這份名單來自各大廠商，多有相關行政或業務人員，未必是工地現場的勞動者。

一般而言，多數女性都面對性別職業隔離現象：其一是水平隔離，指男女普遍受雇不同職業別，女性職業待遇與條件較男性差；其二是垂直隔離，指同一職業內男性位於高階，女性多處低階，或男女同工不同酬（朱若柔，2010）。營造業就是男多於女的水平性別職業隔離，女性在其中多半承擔較不利的勞動條件。但這份名單至少清楚地標示了，蓋一座大樓所需投入的勞動人力，在性別比例上並非過往工程碑所呈現的如此懸殊，建設不只在工地上的直接勞動，還包含各種設計與規劃及行政等複雜的連帶勞動。若將各個工種的付出都涵括在建設成果內，女性並未在公共建設中缺席，她們佔有的比例遠比一般人想像得多。

伙伴碑以七彩琉璃牆現身，色彩飽滿明亮，碑文敘事帶點文青風，整體

看來有一種女性化、現代性的節慶感，幸而一萬個名字以其自身的力量帶來相對的沈靜感。就材質而言，碑體的琉璃磚呼應臺北 101 大樓的琉璃外牆，產生視覺符號的一致性，牆面的姓名也覆蓋在大樓的倒影上。不過，高聳的摩天大樓作為陽具隱喻的陽剛本質，與伙伴碑陰柔平置的母性之感，還是形成空間意像的拉鋸對比。

(五) 關鍵字：伙伴、軌跡、故事

工殤碑最後一座琉璃牆，正面鑲嵌菱形框架，以白底紅字書寫：

此時此刻

依然有眾多的伙伴

追 前人的軌跡

繼續著臺北 101 的故事

一個永不結束的故事

At this moment still many partners

Following the tracks of the forerunners

Continue the story of TAIPEI 101

A never ending story

伙伴碑的人名很多，敘事的文字卻不多，只見於前後二塊磚牆上。但這麼少量的文案，除了臺北 101 之外，居然還有三個語彙是重複出現的：伙伴，軌跡，故事。「伙伴」(partner)取代了工人、勞動者，夾帶資方與政要；「軌跡」(track)以抽象的指涉，避開每一個人具體的參與方式，投資、管理、以及勞動內容都成為扁平的抽象隱喻；「故事」(story)則不知所云，臺北 101 的故事是什麼呢？永不結束又意指什麼？這麼醒目的碑，這麼空洞的內容，如今看來除了工殤者的名字被留下來，萬人名字也許平衡了族群、性別落差，碑文幾乎沒能承載太多可供探討的歷史敘事。持平而論，第一座牆的碑文從「空間」下筆，最後一座牆的碑文起手式則是「時間」，空間與時間相

互呼應，原本可以折射出集體記憶的豐富面向，可惜從行文脈絡完全讀不到衍伸意義。

(六) 落款的勞資張力

最後一座碑牆的背面，在長方形的白色透明磚上以紅字書寫臺北 101 的出資團隊，及伙伴碑的設計、建造及籌備單位。

臺北 101 由臺灣菁英企業共同投資興建：

宏國開發，中聯信託，中華電信，兆豐金控，中信金控，國泰人壽，臺灣證卷交易所，華新麗華，捷和建設，新光人壽，中國人壽，第一金控，大佛山，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宏泰人壽，臺灣人壽

伙伴紀念碑由臺北金融大樓（股）公司及下列企業機構設置：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永峻工程顧問，大陸設備工程顧問，熊谷組營造，華熊營造，榮民工程，大友為營造，中國鋼鐵結構，新日本製鐵，三星綜建營造，西門子樓宇科技，鼎順工程，開立工程，欣菱工程，嘉特納維幕牆，蘭克斯燈光，臺北市產業總工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 日

臺北 101 的「菁英企業」名單大半都是金融保險業，他們共組了臺北金融大樓公司，與臺北市政府簽訂 BOT，擁有七十年的開發經營權。至於設置伙伴碑的營造機構，都是承攬臺北 101 工程的跨國、本土大財團，但 331 大地震五名工殤者的直接雇主只有聘僱孫同英的欣菱工程在列，僱用陳信陽、陳又禎的神洲建機，以及林建成、陳錦水的聘任單位捷祿機械都不在名單中，顯然這二個單位也是下包廠商，甚至不夠資格出現在碑上。最後墜底

的北市產總、工委會、工傷協會則是費時五年共同討論確認伙伴碑的勞工團體。

這個洋洋灑灑列名大放送的名單，適巧補足了臺北 101 出資及建造的資方脈絡，也保留勞資並列的矛盾，不失為當代一頁史蹟。只不過，如果伙伴碑是個突出勞安問題的工殤碑，落款還會如此壯觀嗎？資方會願意拋頭露面嗎？從碑文敘事對「工殤」的遮掩看來，伙伴碑恰好反映了勞資力量對比下妥協的結果。

（七）文化地景的失憶與記憶

現代都市規劃中，除了因應商業需求，也要搭配文化提昇。臺北 101 大樓依照政府頒布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採總建築費用的千分之五作為公共藝術設置，在辦公大樓和購物中心週遭，共有九個設置點，聘請美、英、德、法、臺、港的知名藝術家，設計了九組裝置作品。精緻文化與商業買賣巧妙搭襯，在臺北 101 的硬體說明中，吸睛的裝置藝術品一直是誇耀重點，而官網的公共藝術圖文說明也很精彩。但其中並無伙伴碑。這七座琉璃磚牆豎立在最顯眼的位置，但碑文避重就輕，臺北 101 簡介上看不到，官網也查無任何說明，像個未列入戶口的私生子。

記憶與遺忘是相互連結的，隱藏記憶就成了遺忘，阻止遺忘無非是加強記憶(Huyssen, 2003: 17)，臺北 101 同意建碑，又迴避工殤，在記憶與遺忘中進退失據。伙伴碑既是目光的焦點，卻又在資料中噤聲隱形，現場沒有指標導引，成為可疑的存在。傷痛記憶若沒能徹底面對，遮掩的紀念也只是牆上的一抹蚊子血，刺目倒比醒目多；若第一高樓在風光的頂點尚知勇敢回顧傷口，做出有歷史意義的回應，伙伴碑就會成為人們仰望高樓時，也能低頭省思的深刻印記。

四、觀眾研究：伙伴碑導覽及回饋單分析

三次導覽分別於 2017 年 10 月 14 日、2017 年 11 月 19 日、2018 年 3 月 17 日舉行，在此依時序以第一、二、三次導覽代稱。第一次導覽的成員為板橋社區大學成人學員，年紀約 32 歲至 65 歲不等，有的夫妻同行，也有人推著嬰兒車出遊，13 女 3 男，計有 16 人。第二、三次導覽的觀眾是臺北藝術大學跨科系的大學部學生，分別有 26 人、21 人。伙伴碑的導覽，從第一面牆的碑文讀起，講述建碑源起，再至最後一面牆說明落款的政商結構，導覽結束後，大家任意在紀念空間走動、細讀碑文，並就近坐下填寫問卷回饋單。導覽回饋單上，簡要敘述臺北 101 伙伴碑的建碑源由及過程，另附上三項提問，由觀眾寫下心得感想。

總計三次導覽共回收 61 份問卷回饋單，40 名女性，21 名男性。本文以 M 代表男性，F 代表女性，Y 是社大成員的年紀編碼，北藝大學生年齡相仿不另記。由於導覽對象有限，問卷回收並不足支撐量化研究的效度，故而在問卷設計上，採取開放式的問答，並在導覽結束後在現場花費半小時由觀眾填寫回饋，收集來的觀眾回應更接近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只是問題與回答皆採書面進行。故而，針對觀眾分析，以問卷的三項提問作為基本分類，針對回應的內容進行意義分析，但以簡單的量化比重作為意見先後序的排列，雖提出人數與比例，但基本分析還是採取質化研究，看重回應的內容所反應的觀點，以及回答中舉出的建議方向，擴大對紀念碑與觀眾互動的想像。



圖 6 板橋社大學員的伙伴碑導覽。(攝影/林仁羿)



圖 7 北藝大同學聽取助教何睦芸導覽。(攝影/顧玉玲)



圖 8 假日移工在伙伴碑前留影。(攝影/顧玉玲)

以下針對三項伙伴碑提問，分析觀眾回應的內容：

(一) 內容、形式、與週遭環境

由於伙伴碑位於最醒目的位置，佔地又大，碑體又搶眼，對大家來說都符合「被看見」的紀念目的，因而提出的意見就會更集中在「看見了之後」的社會意義。依回應份數的多寡分依次分列如下：

1. 造型引人注目：被看見 VS 被誤讀

伙伴碑的地點及表現形式都很醒目，幾乎所有人都同意很吸引人，許多人以「漂亮」、「親民」、「活潑」、「比較不容易被遺忘」，「具地標性也相當引人注目」來形容，45人(74%)認為先吸引目光較重要，但也有16人(26%)擔心只被視為觀光景點。

觀光勝地的醒目地標，碑的顏色活潑顯眼，充滿動力，以正向樂觀的呈現去紀念前人的足一印。(F01Y42/2017.10.14)

在臺灣最重要的景點能有這樣的紀念碑真的很不錯，要記住前人的辛勞。(F02Y45/2017.10.14)

兼具公共景觀的美感與完整表達紀念意義，設計很棒，位置醒目，對貢獻者表達了至高的尊敬。(M06Y50/2017.10.14)

樣式很美，製作成比較活潑的形式是正確的，容易被看到，就算只是被外表吸引但就達到紀念的目的了。(M11/2017.11.19)

我很喜歡，少了死亡的沉重感，多了幾分親切以及絢麗。(F05/2018.3.17)

伙伴碑的醒目、活潑幾乎一面倒獲得肯定，但「鮮明活潑」、「親切絢麗」的字眼都不能單獨抽空來談，而是建基在工殤碑的沈重哀傷本質，以及臺北

101 繁華商圈的地理因素。在大獲好評聲中，現場隱然感受到觀眾的認同來自一個更複雜的環境因素：這裡是臺北 101，「臺灣最重要的景點」，在最昂貴的都會地段，在最多觀光客聚集的所在，統獨人士及法輪功都爭相來此舉牌推銷政治主張，原本不受重視的工殤碑居然佔有最大、最醒目的位置！正因為活潑造型與哀傷本質的矛盾，繁華商圈與弱勢工殤的矛盾，人們才更肯定伙伴碑的存在是「對貢獻者表達了至高的尊敬」，並且認為「就算只是被外表吸引但就達到紀念的目的了」。

紀念碑成了風景，人來人往在此佇足，就算不懂上面的文字但感動的分享卻是最美好的，用愉快色彩來紀念悲傷，積極正視事故背後的創傷，才能真正療癒。這碑很美很公平。(F13/2017.11.19)

這樣和藹親切的一個紀念碑，並不會因為形式而讓人感到輕率，反而促使更多人去好奇上面的文字，以及它背後的故事。(F01/2017.11.19)

我喜歡人們跟紀念碑合照的舉動，雖然大部分遊客不曉得是紀念工殤，但開心留下倩影也讓這些紀念碑少了沉重哀傷，知道的人感謝他們的犧牲，不知道的人也因為認同而知曉了故事」(M06/2018.3.17)

半數以上的觀眾，因為肯定伙伴碑接近人群的可親作用，會站在善意的立場，採優勢解讀(preferred reading)，完全認同伙伴碑呈現的溫暖、撫慰的符碼，並為其可能資訊提供不足、或引發誤解處，主動尋求解套。在這樣的認同下，觀眾對於「人來人往在此佇足」及「和紀念碑合照」的舉動，都會自動聯想到會達成「就算不懂上面的文字但感動的分享卻是最美好的」、「促使更多人好奇上面的文字及背後的故事」、「不知道的人也因為認同而知曉了故事」等樂觀成效。死亡是如此沈重，勞工是這麼邊緣弱勢，居然可以在世界知名的摩天大樓前佔有一席之地，且閃閃發亮，光是那種「很美很公平」的直接感受，就帶來療癒了。

許多遊客，會因為它繽紛的外觀而駐足拍照，但他們或許都不清楚自己在跟什麼合影吧？(F10/2017.11.19)

這裡是觀光客拍照聖地。遊客都把它當作藝術品而非工殤碑，實在應該讓更多人知道七彩背後的悲傷故事。(F01/2018.3.17)

也有二至三成的人擔心，由於碑文的避重就輕，未能直接陳述工殤事件，使得這些經過導覽的人更憂心其他觀眾沒能瞭解實情，因而保留自身疑慮的立場，對伙伴碑進行協商解讀(negotiated reading)。他們一方面認同伙伴碑明亮活潑的編碼，肯定遊客被吸引而駐足；一方面又擔心碑文解釋不明，觀眾會「把它當作藝術品而非工殤碑」，使悲傷故事不被瞭解。也就是說，碑的形式是好的，但碑文的說明性卻是不足的、曖昧的，觀眾感受到內容與形式的不一致性而保留部分不同意。

2. 以名字作為紀念主體：有力量 VS 很反感

一萬個名字作為碑的主體，32人(52%)認為很有力量，10人(16%)認為勞資並列很反諷。對於七塊七巧板拼湊的琉璃牆上密密麻麻的人名，形成伙伴碑的主體，獲得逾半數人的強烈認同。真實的人名本身已然俱備力量，感受到真實的勞動付出以及其飽含的生命故事。

一萬多個名字，讓人感受大樓是由許多人的力量才能完成。
(F12Y53/2017.10.14)

不論是不幸喪生的人亦或是還活著的人們，看到這碑都還是很有感觸吧？即使像我這樣的旁觀者，看到一萬個名字排列還是會感到震撼。(M09/2017.11.19)

紀念碑把所有工人的名字都列上，感受到的力量還滿強的。
(M20/2018.3.17)

一萬個名字在數量上的龐大，本身就帶來強大的集體力量，令人感動，也獲得認同。但認真細究，以人名作為紀念碑的主體，也要尊重名字所代表

具體的人，網路資料庫可以承擔龐大的生命故事與影像記錄，而紀念碑上則該相對應方便親人搜尋。例如，1982年越戰紀念碑容納了58,132個名字，名字按死亡年份排列，從牆中間的高點向右排列如閱讀書本，牆側的名冊上提供索引，至今仍有人在碑前找到名字拓印、獻花致意。也就是說，量大的人名若能搭配有意義的排列方式、公開的社會參與，觀眾才會深刻感受到對生命的尊重。可惜的是，伙伴碑的姓名排列經觀察探究後，看到政商名流的姓名全放在最前面，觀眾不免心生矛盾，感到與紀念不相襯的諷刺，因而產生反彈、批判：

沒有必要將大企業和工人團體一起用同一個表象來呈現吧？這樣絕對很少人會知道它紀念工殤的意義。(M16Y65/2017.10.14)

伙伴碑位於臺北最繁華的地段，紀念工人的勞動犧牲，但造成他們傷害的資本家名字也在碑上，在此地繼續賺取更多金錢，很諷刺。(M19/2017.11.19)

資方名字在勞方的前面，恰好呈現出另一種真實感，原先應該為工殤者發聲的紀念碑，反而將現實世界的情境以微妙的方式轉換出來，有些諷刺卻也意外寫實。(F08/2018.3.17)

伙伴碑的列名方式，充滿了辨證的張力。既名之為伙伴，又偷渡官資論輩排行；既協商蓋一座藍白領及本外勞都有的勞工碑，最終卻是和大老板與企業財團都一併同列。資方在碑文中迴避工殤、肯定政商，希望保持臺北101的美好形象。諷刺的是，政商名字優先排列的方式反而激發觀眾的「對立解讀」(oppositional reading)，指出表面上看不到的對立意義：「資本家……在此地繼續賺取更多的金錢」、「都是在利用這個碑」，因而出現「沒必要」、「很諷刺」、「意外寫實」的矛盾感受。而這些張力無非是來自力量的對比、核心價值的衝突，無法調和，難以抵銷，「將真實世界的情境以微妙的方式轉換出來」。伙伴碑在勞資較勁的過程中，留下許多矛盾與破綻，反而開啟更複雜且歧異的解讀空間。

3. 伙伴被濫用，藝術變遮掩

更有 9 人(15%)指出，以含混不清的碑文遮掩工殤慘酷，令人不滿。正因為豪華商圈與哀悼工殤的高度對比，有少數觀眾因而更提高警覺：

伙伴應該是互為平等的，然而紀念碑上的名字、分類，卻隱藏階層的劃分。「伙伴」這個詞對我而言像是被濫用，以幫助美化這個紀念碑想要紀念的悲傷的事。(F14/2017.11.19)

伙伴碑徒具鮮豔活潑的色彩形式，卻無法與紀念碑的功能性與內文脈絡相扣合，是最失敗也是最可惡的地方。(F10/2017.11.19)

帶著建設的面具殺人，真的很令人難過。(F20/2018.3.17)

紀念碑終究不只是一個藝術品，有其不容迴避的功能性與既定脈絡，假如立碑者不去面對這背後的命題而只是轉身逃逸，那麼文創化的紀念碑就只是一尊巨大的觀光噱頭而已。(F18/2018.3.17)

藝術性的轉化，可以將沈重的哀傷昇華至透亮的反思，但若未進行深刻的反思過程，也可能以藝術外衣遮掩殘酷真相，達到反效果。臺北 101 資方一直想迴避死亡晦氣，既要紀念工人，又在碑文中曖昧不敢直指職災，如此只會激發觀眾的反感，以對立解讀來全面質疑紀念碑的本質，認為「伙伴」只是美化悲傷，是「最失敗也是最可惡的地方」，觀眾甚至會直指臺北 101 是「帶著建設的面具殺人」。

碑文分析中，可以看出臺北 101 資方有意淡化伙伴碑的工殤色彩，但從觀眾回應卻發現，很多參觀者得知活潑絢爛的伙伴碑原意是向工殤亡者致敬後，反而更喜歡這個不流於傳統造型的紀念碑。很多人因為這麼沈重的碑卻被放在這麼醒目的位置，對臺北 101 的業者產生敬意：如此時髦漂亮的外型，卻承載著沈重哀傷的重大意義，使伙伴碑的深度與厚度都加重了，力量也強大了。

(二) 擴大社會討論，不被輕易遺忘

伙伴碑已然受人注意，觀眾就不免想要更進一步的歷史教育。回饋單的提問二鎖定如何擴大伙伴碑的社會能見度，回收的建議多集中在如何增加更詳盡的說明與指引，以免只被當作一般裝置藝術看待。主要的建議策略中，有45人(74%)認為碑文應該修改，加強工殤說明才不致引起誤解；35人(57%)主張加強媒體及行動宣傳，特別是網路媒體；16人(26%)提出現場應有指標或文宣導引；13人(21%)表示自己會主動向旁人介紹這段歷史。

1. 碑文不可迴避職災事件

不是只要建碑就完成了，更深入反省才是重點。
(F09Y35/2017.10.14)

碑文要把事件始末寫清楚，讓大家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而犧牲。
(M11Y40/2017.10.14)

紀念碑不是事件落幕或安慰人的手段，而是讓事件能有機會被更多人瞭解、記得的起點，引起大眾對共同環境的關注。(F19/2017.11.19)

觀眾多覺得碑體很醒目很吸引人，但碑文所敘述的工殤意涵不夠明顯，需要增加的是在碑文中明確指出其紀念意義，「讓大家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而犧牲」、「讓事件能有機會被更多人瞭解、記得」。建碑不只是「完成」、「落幕」、「安慰」，能夠「深入反省」、「引起大眾對共同環境的關注」，才是工殤碑該有的社會作用。

2. 主體建築內要有伙伴碑的導引及文宣

101大樓一年辦不少光鮮亮麗的活動，如果能辦活動的同時，在伙伴碑前舉行工安講座或活動，以101的人氣引起的關注一定比臉書文章或書本更有效。(M15Y32/2017.10.14)

要求國內外導遊要講解伙伴碑的歷史故事。(F22/2017.11.19)

伙伴碑本身就足夠引人注目又位處觀光景點，若有解說人員，遊客在放鬆的狀態下很能夠接收新的資訊。(F20/2017.11.19)

觀眾們肯定臺北 101 業主將工殤碑設立在醒目的地點，造型也活潑有吸引力，但是，也對於臺北 101 消極不宣傳伙伴碑及其工殤意義，感到不滿。因此要求臺北 101 不能只是建碑了事，要再進一步負責推廣。觀眾提出多項可行方案，都是在既有的觀光架構下增加書面說明與導覽，以臺北 101 的曝光度來說，附帶成效就很驚人，既毋須增加經費，也對業主形象有利。

3. 我與我們的自主傳播動能

上述有關宣傳的方式有千百種，但多是冀望企業或政府發動，這無非又是回到政治角力的現實場域。幸而還是有不少觀眾主動回應，將會把工殤訊息對外傳送，一傳十、十傳百的螞蟻接力，激發每個人都有自主對外傳播的動能。

我身為一個在臺灣長大的臺灣人竟然不瞭解這些，看完回去後會做紀錄用臉書分享出去。(M01/2018.3.17)

除了透過自我漫遊式的尋訪，我們也可以跟好朋友們分享自己看到的，讓這社會的共同記憶不會失傳。(F07/2018.3.17)

這部分的觀眾留言從「應該」、「如果」的客觀建議，改變為「我」及「我們」的主觀發語辭，承諾自身就是行動體，會主動對外介紹、傳播伙伴碑的意義。從被動接收到主動傳播，觀眾扛起記憶責任。

(三) 經過導覽的開放性感想：

實地踏查工殤碑，以身體去感知、學習，經過專人導覽的觀眾留言，有 36 人(59%)肯定勞動價值；15 人(25%)提出對臺北 101 有了更複雜深刻的認識；14 人(23%)回饋了與自身相關的行動反思；還有 4 人(7%)提出建碑不如

補償工人或加強工安。

4. 肯定勞動價值

觀看這些歷史，總讓我有種「活著」的感覺。活在這個繁雜又細膩的社會裡。(F18/2017.11.19)

當被隱藏的歷史被挖開，似乎越能知道一房一樓蓋來不易，會讓人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件資源。(F14/2018.3.17)

六位工人的生命以此種方式延續，希望愈來愈多人可以瞭解這個事件，感受臺北的人文社會歷史。(M03/2018.3.17)

新的史料，鬆動原本認識的邊界，「活著」、「珍惜」是多數人對於看過伙伴碑的感受，感覺身邊到處都有勞動歷史，「一房一樓蓋來不易」，對「成就這一切的人們」心懷敬意，「一切變得不一樣了」、「感受臺北的人文社會歷史」，對城市有更深刻的認同。伙伴碑帶來的省思，不侷限在臺北 101，而是整個城市的、歷史的。

5. 改寫臺北 101 地景：從「物」到「人」

站在紀念碑的角度抬頭不見頂 101，一想到好多人的犧牲，突然覺得它給我的印象不再是 shopping mall、跨年煙火，而是一群人的痕跡，讓人在心中肅然起敬。(F13/2017.11.19)

導覽時聽到一個非常感動人的故事，工殤家屬說以後要帶亡者的兒子來看他爸爸蓋的大樓，我想當兒子看到 101 大樓時，不僅是那幾塊碑，連整個 101 大樓都是紀念碑。(F25/2017.11.19)

記得剛來臺北讀書時看到 101 大樓，它一枝獨秀站在臺北盆地上，儘管曾在照片上看過數次，那個瞬間還是讓我感動萬分。紀念碑讓我們看到了大型建設背後的真相，高聳入雲的大廈背後卻是斑斑血淚，也意識到了職安的重要性。(M23/2017.11.19)

臺北 101 大樓是個很不一樣的大樓，是臺北市行銷全世界的觀光指標，也是跨年煙火的全國矚目焦點。工殤事件讓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多了點歲月的磨損、傷痕，是「一群人的痕跡」、「好多人的犧牲」、「好多人力興建而成的」，若有足夠的誠意溫柔撫觸歷史，只會更增加歷史風華，「讓人在心中肅然起敬」。但若是一意求新掩過，則放再多的煙火都沾染一身排除不去的塵霾灰燼，「高聳入雲的大廈背後卻是斑斑血淚」。

一般人原本對於臺北 101 只有消費印象，是大商場與跨年煙火，那都是屬於「物」的；但經過伙伴碑的導覽後，觀眾才直視大樓背後的勞動與傷害，看見一個一個「人」的付出，甚至因為同理工殤家屬的心情，而想像出「整個 101 大樓都是紀念碑」。共有 8 人(13%)提到工殤家屬致辭表示未來要帶亡者兒子來看碑，十分感動。那是導覽中的一小部分，但卻被多位觀眾不約而同提起成為最動人的部分，個人的紀念成就公共紀念的正當性，而紀念的公共性也撫慰了私己的創傷。

6. 與自身相關連的行動反思

我當天聽到好幾個觀光客仔細地看了碑上的字，並和身旁的人討論了一下，但大多是國外遊客。反倒是最該瞭解和關心這些事的我們，經過無數次都沒仔細看過吧，多諷刺啊。(F09/2017.11.19)

經過這次導覽，我覺得自己對於社會十分無知，蠻愧疚的。以後我應該更多關注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並努力讓這些事情不再發生。(M06/2017.11.19)

「記憶之所」承載歷史過程的多重記憶，經過導覽後，伙伴碑成為立體的、有脈絡的、有故事的存在，能引發與自身關連的對話與參照。當下的反思，更會敏感於過往的「經過無數次都沒仔細看過」、「對於社會十分無知」，因而希望自己「更多關注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從肯定勞動價值的感恩，到愧疚於過往的無知，進而就是對未來行動的期許，「努力讓這些事情不再發生」。

7. 建碑不如補償工人或加強工安

紀念碑雖然是大家認識歷史、討論工殤的觸媒，但經過導覽後，得知伙伴碑總價一千八百萬元，也不免令人很實際地盤算，與其花上千萬蓋漂亮的紀念碑，何不給予工殤家屬更實質職災補償？又或者把這些錢花費在加強工安上不是更有意義？

我蠻喜歡它在老舊中走出新概念的做法。但花這麼多錢不如拿一些錢去做其他的事，如多給事故家屬或拿去投資加強工安保障之類。
(F16/2017.11.19)

所有偉大工程的成功下，都有人的犧牲奉獻。如果把用於此項藝術品的部分花費拿去貼補工人，會比較好一些。(M06/2018.3.17)

事實上，建碑、補償、工安並非相互抵充的三種選項，而是彼此檢驗、互為表裡的同一理念。觀眾雖然提出：「花這麼多錢不如拿一些錢去做其他的事」、「用於此項藝術品的部花費拿去貼補工人」，都很明顯只要提領部分金額而非全部，並非不建碑，而是相較於工人的所得感覺建碑似乎花費過鉅。在工殤本質未經嚴肅面對的狀況下，藝術形式可能被解讀為粉撲，甚至經由觀眾的主動聯想，而成為對抗的焦點(Young, 1993)，引發更大的反彈。

建碑帶來的是哀悼、反思的抽象意義，留下記錄作為反思的歷史基礎，是為了促成未來不再重犯錯誤。如果建碑紀念，但工安未能隨之改進，則紀念碑就像照妖鏡，反映現實的錯繆；同樣的，如果哀悼亡者，卻未能給予家屬合理賠償，那更是二度傷害。回應這個提問也應該同時反問：建碑是資方該主動做的事，為何花費在建碑的錢卻會令人聯想到補償與工安仍有虧缺，因此要挪東牆補西牆呢？為何不該主張，這筆花費應該來自資方原就該付出的勞動成本？正是因為資方省下了安全衛生支出，才導致工人職災，不論是事先預防、或是事後補救，都是資方必要的勞動成本。

五、結論：以行動創造民主參與的集體記憶

利用視覺可見的物體來保存記憶、喚起記憶，特定空間或建物最有代表性。紀念碑企圖將記憶物質化，經過歲月的淘洗，更滋生不在原先預期之內的多重寓意。本文以臺北 101 伙伴碑的碑文及空間作為敘事文本，指出碑文以摩天大樓作為主體、迴避工殤、與扁平化的英文翻譯，分析主碑體上眾多姓名所呈現的階級、族群、性別的意涵，以及文化地景的記憶落差。此外，研究設計三場伙伴碑導覽行動，收集觀眾回應，豐富記憶之所的探究向度。對工殤碑得以進駐豪華商區且造型醒目，多數觀眾都很認同，對臺北 101 增加敬意，但發現政商列名第一排、且碑文曖昧迂迴後，部分觀眾會反彈至否定性的對立解讀，認為藝術只是遮掩真相。

研究發現，觀眾都認同工殤碑上應留下受害人姓名，以建立紀念主體，但如何收集、排列人名，更是關鍵。伙伴碑鏤刻數量龐大的人名，確實在視覺經驗上形成強大力量，但名字指涉了真實的人，伙伴碑也因而承擔了更重要的記憶責任：名字如何被收集？如何記錄？如何排列？是否有遺漏？當初勞工團體主動提議以勞動者姓名為主碑體，但受限於僱傭關係，名單只能委由資方全權掌握，排列方式也未能開放社會討論。從觀眾研究中，可以看到收集名單與排名方式都會嚴重影響觀眾對紀念碑的解讀。以人名為主體的紀念碑，為了讓人名適得其所，需要耗費考查的時間與金錢，開放生者參與亡者的哀悼工作，也讓社會藉著建碑重新記憶與反省。生者與亡者姓名可以共存，也可以留白待補，但最重要的是邀請社會參與，才會讓個別人名呈現社會連帶的公共性。工殤碑需要一定時間的醞釀與籌備，組織各種社會力量進場，勞工家屬、相關勞動及文資團體、或是一般社會大眾，也需要找到參與的方式，形成對話及互動。建碑的過程，就是社群建構意義、形成認同的過程，唯有民主參與才會導向紀念公共化。

傳統的紀念碑多半是宣示性的：昭告天下、緬懷勇者、肯認成果，但當代對於紀念物件及空間，強調意義的開放建構，給予觀眾參與更大的自由 (Young, 1993; Butler, 2006; Krzyanowska, 2016; Eross, 2017)。雖說原始碑文

會決定了歷史敘事的主軸，但任何人都可以親近、使用紀念碑進行不同的行動與詮釋、或反詮釋，不管是獻花還是塗鴉，甚或是被大眾棄之不顧，都呈現了特定的政治現象。伙伴碑以其引人矚目的優勢作為基底，吸引觀眾來到眼前，其衍伸的意義就不再限於原本封閉的碑文敘事，而是建碑之後所引發的社會討論、行動，刺激多元視角的集體記憶，讓更多的解讀與傳遞的責任落在觀眾身上。

晚近博物館的觀眾研究，強調包容、反省多元歧異觀點的策展，得以引發觀眾的提問與反思，而非對觀眾提供終極答案，促成互為主體的觀眾經驗（陳佳利，2007：141；張婉真，2014：221）。如何創造觀眾主體被激化的環境及條件，避免單向引導的敘事，形成多元解讀，更進一步促成社會對話的平台，都是紀念碑作為公共地景所應承擔的責任。臺北 101 是繁華的觀光消費商圈，伙伴碑置身於人潮高度流動而非封閉的公共空間，故而觀眾研究只能鎖定經過導覽的特定觀眾，從而也帶來可預見的研究侷限。板橋社大文史課的成人學員、北藝大選修記憶政治的大學生，原本就對歷史及社會議題感興趣，並非一般的逛街人潮，此侷限一；導覽延一定的動線及說明，難免受到導覽員的特定立場影響，此侷限二。這同時也挑戰了我身為行動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角色，如何在導覽過程中激發觀眾的主動性，而非引導與說服？我選擇公開說明我的參與歷程，提供完整的客觀資料，不迴避衝突，儘可能以立場鮮明、但開放對話的方式，避免一元式的引導，鼓勵觀眾現場提出疑問與意見。雖然在現實的結構上，作為導覽員的我也同時帶有教師、工運組織者身分，同學們不免因為對我的信任而受影響，但現場開放式的問答及對話，以及導覽結束後的回饋單書寫，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與自我看法轉變的省思，仍深具研究價值與意義。三次導覽的問卷回饋單共有 61 份，數量有限，無法形成量化研究的有效數據，但回饋單採開放式問答，且現場提供充分的書面回應時間，收集到的素材也超越一般問卷，有深刻的個人反思與對集體記憶的重新定義，對未來以工殤碑作為社會參與平台的想像，帶來重要啟發與思考。

伙伴碑原本是創傷記憶的凝結，卻置身在繁華的消費地景中，處處顯現欲言又止的破綻：醒目活潑的造型，意旨不明的碑文，政商人物名列前茅的鑿痕，還有跨國財團、金融資本與本土勞工團體並列的張力。這個時間與空間交錯的意義平台，充滿歧義又多所矛盾。Nora(1995)的「記憶之所」擴大了、或證明了集體記憶的無限容量。331 事件至今未滿二十年，建碑並非將集體記憶凍結此處，而是反思的起點，以後續的行動與過往對話：工殤亡者家屬的追蹤報導、倖存者的勞動處境、工人與文資團體的介入，都得以擴大伙伴碑的多重視角，逼近歷史的多元切面。建碑前的討論很重要，建碑後的對話更重要。紀念碑保留某個階段的記憶形構，研究、導覽、對談都在注入新的改變，只要「有意記住」，都可以邀請現在的觀眾進場，以當代觀點為歷史配音，持續對話，朝向多元化與民主化的集體記憶。

臺北 101 競高形象與伙伴碑平實牆面，相互映照；大樓以多節式設計「節節登至富貴頂峰」¹⁷，與紀念碑悼念工殤的深沉寓意，彼此矛盾。從碑前的仰角來看，大樓與主碑文相呼應，碑文所呈現的歷史敘事，工殤事件與亡者及生者都是客體，摩天大樓才是主體。在這個流動的紀念空間裡，有過往的創傷累積的歷史，也有此時的消費休閒，若再輔以觀眾研究所建議的現場導覽、指標說明、觸及式的雲端口述故事、研討會活動、記錄片等，有助於加強與觀眾互動，以創造更多元的意義競逐。唯有主動參與的觀眾，才能超越以摩天大樓為主體的碑文敘事，成為伙伴碑新的主體。

¹⁷臺北 101 官網「設計理念」，檢自：<https://www.taipei-101.com.tw/building.aspx#SCROLL1>（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參考資料

- 王啟祥，2004。國內博物館觀眾研究知多少？博物館季刊，18（2）：95-104。
- 朱柔若，2010。職場中的性別主流化：從性別統計看就業平等政策之成效。城市發展，頁：8-25。
- 何培夫，2001。臺灣碑碣的故事。南投：臺灣省政府。
- 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1999。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 周靈芝、項幼榕譯，陳香君著，2014。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臺北：臺灣女性藝術協會、典藏藝術家庭。
- 陳佳利，2007。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6：105-143。
- 陳佳利，2009。創傷、知識與回憶：探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展示建構與詮釋。臺灣文獻季刊，60（4）：436-470。
- 曹常成，2005。建立塔式起重機耐震設計規範。工業安全衛生月刊，191：29-40。
- 曾國棟，2004。臺灣的碑碣。臺北：遠足文化。
- 曹欽榮，2011。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濟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 陳瑞樺，2013。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創設為核心的考察。文化研究，17：7-44。
- 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臺北：北藝大，遠流。
- 黃艷紅譯，Nora, Pierre. 編，2015。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南京：南京大學。
- 楊俊隆，2003。超高層建築塔式起重機施工安全防災管理之研究—以臺北 101 為例，交通大學工學院產業安全與防災學程。
- 臺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編，曹欽榮著，2015。第九章紀念博物館和轉型正義。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二：記憶歷史傷痕，頁：136-156。新北：衛城。
- 蔡榮根、王森源、楊榮異、黃文正、江世雄，2002。臺北國際金融中心新建工程 331 震災塔吊掉落事故原因鑑定報告書。臺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 劉婉珍，2011。博物館觀眾研究。臺北：三民。

- 戴麗娟譯, Nora, Pierre. 編, 2014。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記憶所繫之處 I。臺北：行人。
- 顧玉玲, 2019。第六章 個案研究：台北 101 伙伴碑。紀念過往，反思現在：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研究所。
- Adams, Roxana (Ed.), 2001. *Museum Visitor Services Manual*.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 Butler, Beverley, 2006. *Heritage and the Present Past*. In: C. Tilley, W. Keane, S. Kuechler-Fogden, M. Rowlands & P. Spyer (Ed.),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pp.463-479. London: Sage.
- Connerton, Paul,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ss, Agnes, 2017. *Living Memorial and Frozen Monuments: the Role of Social Practice in Memorial Sites*.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55: 19-32.
- Halbwachs, Maurice, 1980[1950]. *The Collective Memory*. Francis J. Ditter Jr. and Vida Yazdi Ditter (Trans.).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 Halbwachs, Maurice, 1992[1941,1952]. *On Collective Memory*. Coser, Lewis A. (Ed. &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ll, Stuart, 1993. *Encoding, Decod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Simon During (Ed.), pp.90-103. New York: Routledge.
- Hein, George E., 1998. *Learning in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ilean, 1992. *Museums and the Shap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lly, Linda, 2005. *Evaluation, Research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rogram Evaluation in Museums*. *Archival Science*, 4(1-2): 45-69.
- Krzyzanowska, Natalia, 2016. *The Discourse of Counter-Monuments: Semiotics of Material Commemora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Spaces*. *Social Semiotics*, 26(5): 465-485.
- Macdonald, Sharon, 2009.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Oxon: Routledge.

- McCall, Vikki & Gray, Clive, 2014. Museum and the “New Museology”: Theory,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9(1): 19-33.
- Nora, Pierre, 1989[1984].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ora, Pierre, 1995[1984].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In: Revel, Jacques and Hunt, Lynn (eds.), Coldhammer, Arthur and Others (trans.). *Postwar French Thought, Volume 1*, Ramona Naddaff, Seires Editor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pp.631-64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Simine, Silke Arnold-de, 2013.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Scott, Carol A., 2009. Exploring the Evidence Base for Museum Value.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4(3): 195-212.
- Urry, John, 1996.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In Fyfe, G. & Macdonald, S (Ed.), *Theorizing Museums*, pp.45-65.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 Young, James E., 1992.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 *Critical Inquiry*, 18(2): 267-296.
- Young, James E., 1993.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附錄：臺北 101 伙伴碑導覽表及問卷回饋單

一、導覽表

日期	地點	導覽人	觀眾
2017-10-14	臺北 101 南方廣場	顧玉玲	板橋社區大學學員共 16 人
2017-11-19	臺北 101 南方廣場	顧玉玲	北藝大學生 26 人
2018-03-17	臺北 101 南方廣場	何睦芸	北藝大學生 21 人

二、臺北 101 伙伴碑導覽問卷回饋單

2007 年臺北一〇一商辦大樓落成，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樓，工殤伙伴碑也同時揭幕。

2002 年 311 大地震時，林建成等五名工人自搭建中的高樓墜落身亡，震驚臺灣社會。協助工人家庭的勞工團體，與官方談判安衛勞檢制度的建立，與資方談判工人職災賠償，並提出建立工殤碑的構想。勞、資、官三方洽商建碑與設計理念，歷時四年，確認以「伙伴」命名建碑，將參與建設的勞動者，不分藍白領、本外勞，總計有一萬名工人的名字全部刻印在紀念碑上，肯定勞動價值，作為伙伴碑的主體。最後一塊碑則將出資公司、工程贊助廠商、勞工團隊也列名，突顯出錢出力、共同參與的意涵。而 331 工殤亡者，及其後一年因電梯作業感電往生的工人張達全共六位，都名列第一面碑上，以示悼念，更作為勞安警惕。

針對紀念碑與週遭環境、地點、呈現形式、呈現內容，以及往來人群，我的觀察：

如何藉由工殤紀念碑擴大社會討論，不要被輕易遺忘，我的建議：

城市踏查，無非是尋找社會的集體記憶。經過說明與討論，我的感想？

姓名